

一、人类学——“人的研究”

这个辞目下面的六篇文章主要是叙述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其他的人类学分支可在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标题下述及。与此有关的项目有经济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政治人类学。人类学的主要概念的历史表明它可能是建立在生态学、种族起源学、亲属、种族和社会结构等基础之上的。

- | | |
|----------------|------------|
| I 范围 | 约瑟夫·H·格林伯格 |
| II 文化人类学 | 戴维·G·曼德尔鲍姆 |
| III 社会人类学 | 雷蒙德·弗思 |
| IV 应用人类学 | 露西·梅尔 |
| • V 当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 沃尔特·戈德施米特 |
| • VI 人类学的比较法 | 埃德蒙·R·利奇 |

I 范 围

人类学，它的名称从词源学上来说是“人的研究”——它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全面性在于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理学的和年代学的范围相关联；与其主要的探索领域，包括语言、社会结构、美术和信仰体系等相关联。事

•注：标题是编者加的，以下的“范围”，“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均选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68年版第一册。“当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的比较法”，暂缺。

实上它是人类科学中唯一研究其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学科。除了这些基本的生物学的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外，人类学还在人文主义方面具有伟大意义，比如说，它着重研究不同居民在工艺学的美学价值的基点。

虽然人类学在原则上是包罗万象的，实际上它只是研究人类学科群其中的一个分支。的确，人类学钻研方面是丰富多彩和各式各样的，这样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它渐变而来的许多小分支，实际所有这些小分支还必须与其他已经完善地建立起来的和独立出去的研究领域一道共同划分它们的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样，人类学也很容易被看成这样一种研究：它的广大范围模糊了事实上还存在的主体。

这个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解决；就问题和方法论来说，存在着某些规定了特别意义的集中点，并把人类学和其分支的基本主题区别开来。即使人类学在主题上和某些分支范围相一致，但它还是倾向于用略有不同的特殊资料，并就问题而言，也要用一般的观点来加以探讨。可以找出一套特殊的相互关联的问题来作为历史上的人类学注意的核心——也就是对人类民族集团相似性和相异性的描述和解释。这个，仅在人类学上一直是个中心问题，并因此用于以使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而且，就这个历史上的主题来看，它还没有象那些在更广大范围内一再延续的主题那样被其他的问题所取代。

因为民族集团在体质形态和社会文化特点两个方面不同，所以，人类学一直与它的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支有关。为了探索人类差异的整个范围，正要考查从固定历史传统里独立出来的社会使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社会制度的最大差异，确保极重要的部分。还要考虑独立存在于历史上最大量的人

类社会组织的独立典型例子。尽管人类学在原则上经常同等重视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研究，但实际上，人类学总是集中于原始的或者说没有文字前的民族，绝大多数指的是那些在最初与西方接触的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些民族。许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特点就是来自于这种成见。这个基本的描述方法，就是通过对于在一个部落内有代表性的组织作比较观察；其重点应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民族志者试图以构成一幅前后相连的完整的情景，用观察得来的原始材料来研究重复的过程。

同样，考古学为了发掘传统的历史学缺少文字记载基本材料的，那些地区和阶段的过去社会的基本史实，考古学的技术就和其他推理方法结合起来（诸如用口头传说，民族学的特点分布和比较语言学）。

就人类种族不同而言，体质人类学和应用生物学的区分也是可以解释的。体质方面对于所有人类共同的东西，一直是关系到作为一般生物学一个专门分支的人类生物学，而体质人类学的传统任务也就是阐述和说明人类体质的差异。就其历史性来说，这也包含根据化石的证据（人类古生物学）复原人类过去的体形，正如考古学尽力去发现关于过去文化的史实一样。

按照这个中心问题，不仅主题和方法论，而且人类学推理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特点也都可以被理解的。因此，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一直是比较法，象文化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这样的基本方法也是试图说明由于某些单一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相似性和相异性。

人类学着重点的重大改变可以追溯到比较最近一个时期，其开始年代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着重点开始转向每

种文化的内部结构，虽然这种着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发掘每种文化独具的“特征”，但是比较的结构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它必然在更广阔的结构内加以结合，人类学者倾向于这样认为：应该调查所有文化的共性，以便构成人类的共性的那些所谓基本特征被我们认识。这个秩序问题能够用理论上的假设加以证明，这种假设就是：在所有的社会里，个人总是按照最高准则而被社会化了；遵守公共秩序。至于联系到社会内部功能的调查，只是个人与文化之间关系发展意义上的一种工具，即原来实际上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方面。

诚然，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就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范围的焦点，但是，传统人类学的着重点的扩大包含了其理论观点，它在与其他分支之间协调方面是在空前规模地更大地发展起来。

最近一个时期，对于这种分支内部间应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人类学的着重点扩大到与运用问题相联系起来，如都市的形式和文明社会。结果，人类学介入主要课题的某些区域（社区研究）和（功能学说）变成与社会学很难明显地划分了。然而，我们应该强调象史前考古学，没有文字的语言学和种族社会的民族志等，这是早已在传统人类学继续长期存在的普遍事实。

分支的再分及其内部关系

按照传统的美国体系，人类学经常分为四个基本的小分支，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除此之外，社会人类学通常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和他的追随者组成的社会功能学派影响下的一个独立分支，他们明确地把社会结构和功能（社会人类学）和对于历史上固定下来的文化的描述分开。从两个分支的任何一支来看，这种划分在某些

方面，实践要比理论范畴多一些，这样用以解决训练学生成为博士的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语言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对于语言的研究很自然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小分支。考古学力图尽可能以史前民族遗物来复原他们的文化，重新建立这种文化的历史上的内部关系，因此，考古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方面。然而，语言学和考古学两者都要求在高度专门化的技术方面，有相当可观的训练；在实践中，这就是把它们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里分出来的基本原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区分并不是对于人群行为的相同客观现象的两种不同探讨，实际上，这种区分消除了，因为人们没从学术上把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围。

基于这种考虑，有些人也这样认为：正象在美国实践的那样，在人类学真正的基本划分是在把人类的体质研究（体质人类学）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研究（保留的分支）加以划分。这种划分的基本特点在下面的事实里反映出来：除美国之外，“人类学”这个术语或者对这个术语的其他翻译（例如德国译为Anthropologie是表示美国的“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是表示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这种划分的意义又在于认识两者间的特殊关系，它反映在称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国际大会”这个定期国际会议组织里。

人类发展了文化这一事实，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它引出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新的因素。用大多数的一般术语来说，人类——作为一个人种——其关键的相应结构，就是文化本身。体质人类学者就此有很多的实际推断。例如，在人类聚居的地方配偶方式是发生社会已定的模式内。这种认识使得人类学的体质和社会文化两个分支有效地、完整地结

合起来了。

许多标明过了的专门化范围，横切或以上列举的基本划法分得更小，并消除了人类学与各种分支或专门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里主要分为两个类型：地区性和典型性。例如：普通的人类学者，尽管他在这些主要的分支的某一个方面是专家，自己还是着重于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具体工作。因此，一个考古学者很自然地对某些特别主要地区发生浓厚的兴趣，例如北美洲，而且经常就是在这一区域里，又会有专门的地方性研究，例如美国的西南部。这样的专门化就从地理学区划来划分的，但是，它要把倾向于共同区域研究的基本范围搞在一起。因此，那些设想的西南部考古学者就会感到，至少需要掌握该地区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起码基本事实，以便去解释它的成果。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与其同行就其分支进行讨论，甚至充分协调他们之间的研究。

人类学在原则上与世界上各个地区均有关系，正如它和所有的社会类型——原始的、文明的或工业化——有关一样。但是，在实践上，人类学在它的各个分支里还是倾向于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地区，如大洋洲或土著美洲，在这里的社会，一直独立存在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处于史前阶段。然而，人类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连同各分支可能研究的范围一并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忽略近东或远东工业化和文明社会，正象忽略史前社会一样的危险。在扩大它对包括有历史文献，有文字文明地域的注意力的时候，人类学必须沿着传统的，地区专门化来探讨。例如，对印度学、汉学和近东区域的研究。在后面提到的这些领域，专家用的方法很可能同人类学者的方法不同，因为人类学者更加强调语言学、人文主义、历史和专门化。文化人类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的着

重点是和典型性一同产生的，根据一般的社会理论来考虑，它还可能研究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因为象农村的研究最适于研究部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那种方法，因此，对两种专门研究人员都有用武之地。还有，每一种都从另外一种那里与自己的着重点和技术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相异之处变得越来越小。

著作上相同的基本标准，构成了从事人类学的考古学者和近东考古学者的主要分界线——前者集中于搞史前的和古典的；而后者关心的是有文字的文化。同样，从事人类学的语言学者专门研究至今没有文字的语言，这里还带有用语言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同时记载下来，但缺少具有传统语言技术的文字分析。

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专门化的另外一个主要基础是课题的。绝大多数人类学者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文化的这些专门的方面，如经济生活、政治、宗教或者音乐。这里人类学又一次地触及到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分支，象经济学、政治学和音乐研究。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只注重按照西方的传统研究它的对象，所有这些课题里相对忽视的分支，而这些分支与非西方文化的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的这些课题有关。相反，尽管人类学声称要有一致的重点，但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地注意非西方的——特别是没有文字前的——社会。

在另外一方面，人类学也不同于标准的分支，它不仅研究非西方的文化环境的比较现象，而且研究符合于主题有关文化的又可以认识和有价值的方面。后者研究的这个分类，很可能包括社会科学以外的问题。例如，被叫做民族植物学的人类学专门项目就调查土著居民的植物知识。应用的着重

点就为这两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结合点。因此，涉及到医学活动规律的医学人类学，就把一个特定民族发生的各种疾病，归于它的生物和社会的因素，而且还研究当地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因为它们构成了文化环境，新的方法将被介绍到这个文化领域里来。

现在在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特别流行的另外一种划分法，是集中和组织田野实地观察得到的资料的民族志，与利用这些材料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据的民族学相分开。类似的划分法也存在于其他主要分支的题材里，例如描述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相对称。这些划分法不能与那些先头的描述法相比拟，因为实际上每个科学家都有相互作用的描述性和理论性的爱好，然而，每个人还是存在着对这方面或还是对那方面的偏重。

最后，人类学也可以分为理论分支和应用分支。人类学者始终认为：科学地研究人类的基本宗旨在于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另外一方面，并不象它的姊妹科学——社会学，它一直没有涉及到社会改革问题的理论方面。然而，它所着重研究的人类福利，也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传统的一个部分。再者，由于西方国家拥有殖民地，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形式发展起来了，但是，绝大部分是被受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行政人员所利用，而不是专门的人类学家所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殖民地地方和国家的发展计划形式更深刻地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在新独立国家里，经常是牵连到在西方国家或者国际机构的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活动唯独在实验方法论的方向上限制了人类学按照观察方法去作。虽然往往不是由人类学者来制定政策，而必须限定政策的条件。

历史

现代人类学是十九世纪的产物。这样的组织形式——第一个人类学团体的建立及在这个课题方面的第一个专科地确定——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是，它的历史当然要长得多。就其十九世纪的特殊形式来说，人类学被这样一种思想束缚着：人类社会是由没有文化的状况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而在没有文化的状态下，人类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基本的不同。这种文化进化论学说从达尔文学说的科学成果里得到巨大的推动力，这可追溯到“物种起源”出现的时候。但是，很清楚，十九世纪人类学基本组成部分是在非常早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并且从根本上脱离了生物理论。这些基本思想是：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可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个）；抽象文化的概念本身可能是科学探索的对象——或者说所有社会上形成的习惯不同于体质的遗传（也是其中之一）；文化的概念经历了连续很长时间的渐进变化（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在其他领域的努力之中，希腊人首先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人类学古典的遗产是无法与历史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的遗产相比拟的。古代人按照记述的地方环境来发展民族学描述的模式。地理的著作也有关于体质人类学和地方习俗的事实和观察资料。这些描述的极一般而又较模糊的事实和详述发展了气候影响文化和生物种类的理论，就予示了现代地理学“宿命论”的出现。民族学对于文化差异的观察，提出了自然人人类习俗与因袭人类习俗问题，提出了一致认为正当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存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类学哲学问题。后来，关于全面发展人类文化的各种理论都得到了探讨，例如，先前黄金时代的传统宗教信条、斯多葛派的循环

理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推论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发展了人类遗产——从“芦克丽蒂丝”的有名的诗歌“事物的本质”里尤能看到这一点。原子论的推论这个学说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进化论的先驱，而且在这里找出神学的退化论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制定的信仰间基本上相互对应的对立面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又一次地重申了。

下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是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学说，和十五、十六世纪的地理探索时期。这些发展以一种新的，重要的形式，对理智的风气作了贡献，就是在这种理智的风气里，现代人类学终究才得以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以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对它自己的现世的经历感兴趣，这不仅仅是为了为长久的今后作准备——给现世主义定了个现代的调子。人文主义者力图通过研究原始材料，而不是通过继承下来的中世纪场面去复原希腊和罗马世界，这样做能为他们提供对于文化差异的一种人类学全面看法。正象人文主义扩大了年代学视野一样，探索（新大陆）的航行扩大了空间的视野，于是，古代社会不知道的整个大陆的民族被发现了。这不仅提供以一种新的规模来收集事实的方法，而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探索（新大陆）所发现的人，与西方人类一样吗？这些有灵感的人值得拯救吗？正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人们难于从《创世纪》的系统表里加以证明。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解释为十个消失了的部落的理论是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人物臆断，那些残存的人口并不是亚当的后裔。因此，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理论，而且这两种理论随后尖锐地相斗了几个世纪。许多理论家象这样设想：难道处于技术发展简单阶段的非西方民族，是在贫乏的政治法律制度起源之前的国家的代

表吗？或许，他们是代表了文化文明兴起前我们祖先的样子吗？下面这种观点后来非常流行，并在不断发展论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不断发展的理论能够站稳脚跟之前，那种认为古代世界优越于现代世界，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必须予以克服。这个工作在十七世纪业已完成。由于在物理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牛顿的综合定理达到了顶点，世界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显示了比古代世界优越。斯威夫特在他的《书之战》里讽刺的“古代人和现代人之战”的区区小事下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伯纳德·方坦尼尔在他的《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不同》一文中，对文化的非积累方面如（文学）和积累方面如（科学）一一加以区别。对于后者即科学，现代的人类要优越些。实际上，人类——粗略地估计——被比作由于年龄增大现在处于壮年时期的人。但是，根据方坦尼尔的理论，这种人类永久不会老，尽善尽美是可能的。

然而，牛顿学说做出了另外的贡献：在物质方面，在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宇宙里，人类也不能例外，那么还是存在着沿着牛顿指出的道路走的问题；实际上，象吸引力这样的概念，在文字的应用上，在十八世纪和以后都是常见到的。

为了描述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有必要做的是，把同时代的原始人当作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前的那个阶段的代表。这个步骤是特戈特在他的《关于世界历史两种研究的初步意见》里采用的，这是一部第一次说明三个连续的经济阶段——狩猎，畜牧和农业——的著作，这与后来的康姆特的《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规律》——神学、玄学和科学——的基本形式一样。

十八世纪另外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克里斯托弗迈纳

的《人类历史概论》。在这部著作里，他推荐了一门新的科学，大致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精神相同，这门新的科学把各民族的所有习俗作为它的主题，它特别注意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

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出现的某些方法论的和唯理智的论据，对建立一个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哲学观点和一般设想的科学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次系统的种族分类，也就是林尼厄斯和约翰·布芦门巴赫的分类，和皮尔特·坎波创始的人体测量标准技术，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也是在这个时期，现代语言学出现了。在十九世纪，语言在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点是：语言能够分成为语族，同一个语族的语言又是由一种单一的语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展成许多分支的。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末叶，就由很多作家，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代，由于弗朗兹·博普、拉斯马斯·C·拉斯克、雅克布·格里姆和其他人的努力，这种思想就发展成系统的比较法，来复原古代的语言。拉斯克首先指出，承认有关语言中声音相同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八二二年，格里姆又使这种想法大众化了，并帮助建立了人类文化变化的一般学说。

在这个时期里还出现了显著的发现，这种发现主要是扩大了关于人类发展的时间视野，并给文化是逐渐地发展的观点加了一个注释。一八二一年，琼——弗兰科伊斯·钱普莱昂对于埃及的著作的解释，以及更明显的是，对于石器和金属的基本考古年代的描述（如一八一九年汤姆森的解释），完全与人类纪年传统思想不同。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著名的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才承认鲍彻·德珀思的发现：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工具共存的合法性。因此，

考古学和达尔文学说结合起来了，并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人类的情景：人类和过去的其他动物一起稳定地定居下来了，并经过了一百多万年更新期中没有文化的类人猿发展而来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分支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人类学或叫民族学协会建立起来了。在德国，“文明”以它的现代的含意而成为一个技术术语，E·B·泰勒用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原始文化》把文明介绍给了英国人民。泰勒的这本书，详尽地，全面地阐述了在一个主要方面（宗教）里，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清楚地叙述了文化科学的理论问题，成为了实际的里程碑（见“泰勒”）。

泰勒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于整个讲英语的国家里，它是人类学最初的代表作，也是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作。其基本作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象这里描写的这样清楚——叫做比较法。无论在哪个领域，文化的进化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早期阶段用民族学的资料记载下来，后期阶段通过历史的资料记载下来，这就导致了十九世纪欧洲的那些机构。因为有些人认为，原始的交配就是婚姻制度的最早形式，所以最早的阶段是假想地推断出来的。生存——方法论的发明物起了突出的作用，也就是，后一个阶段存在的这种制度带有前一个阶段这种制度的原始情况的形迹。因此，L·H·马根推断，因为在夏威夷，被解释为“父系”的亲属关系这个词，不仅是用来表示“父亲”本身，也用来表示爸爸和妈妈的兄弟，在比较早一点的阶段，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分别是一个又一个人的爸爸（见马根，刘易斯·亨利）。另外一个基本设想是，人类心理一致。人类特性基本相同，说明即使其地理位置相距很远的民族，也可能在习俗方面有

很多是一致的，而这就是某一个阶段发展的象征。因此，特别是这个学派的后来的成员倾向于用独立的，平行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冗长的历史过程，来说明文化的相同性。

德国，在这个阶段里，居人类学领导地位的人物是阿道夫·巴斯蒂恩。在他的主张里很难找到用“阶段”这个词来表示实际的年代顺序，更没有系统地运用比较法。Elementargedanke的关键概念和“心理一致”的概念起着相同的作用，巴斯蒂恩的主要信徒理查德·安德烈的工作主要在于证明这些文化的相同性（详见“巴斯蒂恩”）。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尖锐斗争，到一九一〇年那些对抗力量便占统治地位了。在讲德语和讲英语的这两种国家里，人们把比较法称作推断问题和追就问题的问题，比较法也导致了冲突，为了代替世界各地的习俗所示阶段的系统组合，重点应放在复原一个假想得更为实际的文化历史，这里不同的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里是用传播和迁移的历史过程来解释文化的相同性。在德国和奥地利，系统的方法论发展起来了，它也就是在弗里茨·格雷伯纳和后来在威廉·施米特领导下的文化历史学派Kulturkreislehre的系统方法论。（详见格雷伯纳，施米特）通过应用文化特性相同的标准，人们认为：可能建立很多不同源流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在原始时期是相互继承的；并由全世界的迁移所传播的。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里，甚至于更为极端的、单一的文化起源理论出现了，并且还很时髦，例如：泛埃及学论和泛巴比伦学说。

同样，美国在弗朗兹·鲍亚士——美国的专门的人类学的奠基人——的影响下，对文化进化论的批评文反应就是他们的主要论题（见鲍亚士）。他们强调文化历史上，只能用

一个极为有限的规模。他们原来想用文化分类法来达到描述的目的，可不久文化区域也被用作复原历史的手段了。他们用传播来解释包括局限的和不断分布的文化相同性。这样，在某些特定的地区，用这种方法，某些特别复杂的文化历史就可得以复原，并往往表现为：与进化论学说相反，制度是在不同地区按照不同的年代顺序发展的。严格地说，鲍亚士自己的观点还是比较激进的，因为他提出了与根本问题有关的设想，其设想是，在不同地区里的不同文化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在鲍亚士的鼓励下，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力图表明，图腾崇拜这个标记已用于各种现象。其中，真正心理学的和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见“戈登威泽”）

象戈登威泽这样的研究，包括了对每一种文化的特殊现象的分析，并把它做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在传播的研究过程中，要被问到的问题，不是这种特有的文化特性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传播，而是为什么被另一个民族接受，而又被另一个民族拒绝；它是怎样被重新解释而又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研究，必然提出每种文化的内部组织原则问题。有一种解答接受了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形式》一书中的古典解释，在这本书里，结合的因素是按照心理术语学来描写的（见“本尼迪克特”）。这方面的兴趣，引起了把人和文化内部相互关系的发展，作为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由于功能学说的兴起，这些一般的趋向才得以增长。功能学说的主要阐述者——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致同意；强调文化特性的，功能的，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都轻视历史型的，对文化想象的解释，这种解释代表了先前所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说认为，文化构成了有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从功

能角度讲，又与生物的和人类的需求有关。拉迪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功能学说——是从法国伟大的社会学者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著作中最早派生出来的——被称作结构功能学说。它把功能解释为对于残存下来的社会结构，并避开了对社会事实作出心理上的解释。而且，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说相反，它还为比较法的应用留有余地，因为，它主张，通过结构的比较后，是能找出其规律的（见“德克海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当前的趋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类学素材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新的题材也出现了，尽管对于大部分题材来说，不再采用过去所有“学派”特征的全面系统的方法来表现。事实上，大多数人类学者对于传统的主张还是持折衷态度。还有，由于受到了社会学的部分影响，在哲学方面，出现了一种极为复杂的问题。显然，这就是强调有关理论建设的方法论，而且这个方法论已经代替了早期人类学者独特的、简便的和半直观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发展，最基本的是，把人类学的题材扩大到非部落社会地原，扩大到非西方社会新兴的都市，即没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那些民族之中。这里所采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形式就是，扩大对社会的研究，而这种扩大带有明显的内部小分支的形式，并与应用对象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这样的研究脱离了社会的范围，但是，人类学者并不是不考虑比较大的单位，如民族国家。因此，“人”这个基本概念是早期文化与早期人类研究中的中心题目，它被马格丽特·米德和她助手一道研究的《民族特征形式》中所接受（见“文化与人”；“民族特征”）。

另外一种趋向，主要是在莱斯·怀特支持下，文化进化论的复生派。其重点放在那些实际上是积累的文化上，例如：环境的技术控制；并把重点放在使历史上已知的，传播的，习俗的事实与这些全面的技术进步相一致起来（见进化论，关于进化论的文章）。

另外一个重点，是社会生态学或文化生态学。环境宿命论的那些比较旧一点的，过于简单的形式，早已被现实主义的主张所代替。现在的目的是，沿着植物生态学者和动物生态学者的道路，详尽地研究一下人类和它的自然环境的内部关系，研究一下在所有环境条件下，社会文化机构的相互制约（见生态学，关于文化生态学的文章）。

在朱利安·斯图尔德的研究成果里，文化生态学分析趋向于用基于对环境生态制约水平的社会文化，来表示结合水平的社会生态学。这里涉及到了平行或所谓多线的目标，还涉及到由低级向高级水平的进化，这是在历史上相同的发展顺序的各个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的。使用交叉的文化比较法（常属统计学类），来找出相同规律的文化现象的联系，是泰勒在一八八九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关于研究机构发展方法与如何应用于婚姻和亲属的规律》中首先提出的。在战后一个时期里，这种方法由耶鲁大学人类关系地区档案馆给大大地扩大了，并且系统化了。G·P·默多克在他的《社会结构》（1949）里，运用这些材料确切地说明了，在亲属和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变化中的一系列的统计概论。默多克的观点也包含有活力的方面，因为在各种亲属系统的类型中，假设某些传统是经常出现的；假设这些变化是由机械作用引起的。对于这种顺序的假设也被应用于复原社会结构史。这种方法论的另外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应用典范是J·W·M·

惠廷和I·L·蔡尔德在《儿童的训练和人》当中所进行的研究；文化交叉研究，其中在文化与个人研究的领域内，不同的假设都是由文化交叉法来试验的。这些假设中包括，儿童抚养实践，人和某些文化机构的联系，这些都是来自于拉尔夫·林顿和艾布拉姆·卡迪纳的弗洛伊德理论（见人类学；关于人类学比较法的文章；民族学；社会化）。

这些交叉文化和其他系统的比较法，着重研究文化一致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差异方面。假若人类机构是复杂的，那么，对所有的文化，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能被声称是真实的，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更典型的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概括性论述也包括在某些可变物之中，确实不变的或统计出来基本不变的性质在内。语言学里探索这种关系的先驱是R·雅各布森。J·H·格林伯格编辑的《语言的一致》那卷论文有，正在增长研究这种交叉语言学的专一性问题。

随着功能学说的各种形式继续不断地繁荣，出现了一种倾向纯结构主义的稳定趋向，这主要是受到了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的影响结果。至少，部分地得到了结构语言学的启示，其基本的主张是，按照高度抽象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社会机构。这是类似于根据相对和相反来划分的声系结构分析的。同样受到语言学鼓励的还有，弗洛伊德，隆斯伯里和沃德·古登纳夫在现代形对于亲属关系系统的语义里首先提出的；和哈罗德·C·康克林，查尔斯·弗雷克和其他人对于亲属分类学的语义分析。大概这些主张产生了代表语义结构微弱的基本因素，并对正在研究的系统给予深刻的结构观察（见“组成分析”）。

很明显，就语言学本身，革命部分的新发展存在于转换理论的形式中，这是由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1957）

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是，一种语言的句子的产生是通过不断地运用一整套基本的规则。对于语法的检验，并不是仅仅使选出来的句子和本地说话人的直观相一致——这里指的是，语法上一致公认的句子，而且是可以透过一些转换的规则清楚地表明一整套句子之间的关系，这种句子关系是这种语言的本民族使用者直观地承认下来的（例如，主动和相应的被动）。原先的描述性的语言学被批评为分类学，因为它与语言学举止经验上确定的体（即小体）一起起作用。在那里，它力图根据只是操作上确定下来的程序来描述语言举止（它是这样宣称的，但没有成功）。转换法语言学的影响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心理学中，也很可能在人类学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见“冈源理论”）。

在考古学方面，更多的是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趋势也包括在着重点变化和相当大比例的方法论的变化。虽然考古学是历史性质的，它本身的特点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它还没有脱离较新的功能学和生态学的影响。由于考古学的资料正被当成为断定人口学的社会统计学形式原始材料，所以，仅以工具形式为特征的文化年代学延续的定义，完全变为了文化对于环境的关系，变为了复原文化没有资料的方面的探索。现在，正试图更广泛地解释历史综合材料，甚至于还追溯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见，如：“都市的革命”）。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尽管这些测量遗传根据的特点还没有普遍地了解，但是，古人类学主要地是力图由测量人体特性来确定的，设想它是稳定的，没适应的，没经历大规模的环境变化的迁徙仍相对比较稳定的杂居，来解释人种史。复原民族史已经没有研究人类遗传成分的功能变化作用那样重要了。人类体质的进化同样也有了新的解释，这是根据遗

传变化的同等机能，根据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结构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涉及到的生理功能的解剖形式的研究所作的这种解释。由于对于比较灵长目学兴趣不断地增加，也就为进行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更为广泛的基础，它特别注意人类的社会组织和交往的非人类的类似物（见“生态学”，“进化论”，“遗传学”，“社会活动”和动物）。

因此，系统地创建人类学的最初阶段是在十九世纪，并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在这一阶段里，其重点放在观察自然的历史类型，个别的文化和各地的历史事实上。相反，当前这个阶段是以具有建设性的，理论的，努力的，丰富多采的特征。并且不同于包括一定时期的功能和变化的历时过程两个方面概念化的问题。这样的时刻看来即将来临，到那时，某些新的假设的理论将要与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相结合，并一致起来。

参考书目（略）

原作者：约瑟夫·H·格林伯格

华中师范学院 邢文藻

中南民族学院 刘孝瑜

译校

译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68版第一册

II 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中的主要部分，主要研究人类的文化。它是人类学的所有分支中，除去那些更直接的与人类生物学和生物学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着有关的分支，都包括在内。它的关键性概念是文化，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和主要方法来研究“人”。给文化下个定义：

文化就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要获悉整个社会是如何活动的方式，它包括所有的知识，共同的认识和愿望——包括人群和孩子辈都要获得的活动方式。

从最开阔的视野来看，文化指的是人类主要的行为特点，文化使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区别，只有人才有语言，使用各种符号，和制作一些相应的使用工具。因此，只有人类才能向他的同伴传递大量的信息和积累起来的经验。还有，所有的人，无论什么种族和环境，都能运用和发展文化的才能。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生物进化是早已被人们所公认的，愈到近代，人类学者已愈能认识到，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只有人类才能使用并传递我们在文化这个概念下所叙述过的那些能力。

人类文化，就是以人类主要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是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与一般的文化概念相反，它包括本群与他群有区别的那些行动、思想、感情和交流的有选择性的模式。每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使用独特的工具、价值观念、思想、文字，而且保持与其他文化的独特结构。

因此，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人群行为的相同处和相异处；描述不同的文化的特征和稳定、变化、发展的不同过程。人类的每一个主要群体，都对他们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做了不同的解答，而这些问题不仅是由于人类生物结构的需要所引起的。

范围和方法

文化人类学的范围和方法是用来说明遗存文化和特别文化的。这包括从人类生活的开始到当前的社会行为的所有方面。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所有的文化，不管是在部落社会中使

用的，还是在复杂的文明化了的民族中使用的文化。合理的、非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每一种行为都要考察。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适应、改造自然环境的技术和经济措施，处理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方法，宗教和艺术的特别经验等，都要予以考虑。不仅研究几个方面的活动，而且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具有特别意义。象家族结构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宗教活动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普通的乡村居民以及杰出的领袖人物的日常生活都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的范围。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按照这个特定的范围行事的。这就需要田野考察、比较分析、和“分子、克分子特别推理法”的全面观点。

全面综合，它认为：每个人都可自由地研究与之有关的任何一种人类行为的问题。因此，研究非洲地方经济发展的人类学者，可能会了解到：如果他要详细描述那个地方的经济变化过程，必须调查礼仪圈和亲属关系。或者，在探索古代文明的时候，不仅定居形式、贸易路线和陶器的风格等等，而且还包括现存的技术，都需要予以考虑。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把一个小型的和简单的社会的全部文化解释清楚，但是通过文化人类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发现很多文化，仔细地研究了某些文化的许多部分，概括出人类文化的特点。

田野考察：文化人类学者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观察获得第一手的、科学的证据。如果它是古代文化的证据，那么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那些专门从事于这个课题的考古学方面的文化人类学者搞到的发掘物。那些研究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者要到他们当中去生活，并以参加交谈和观察的方式了解他们的社会和文化。首要的是观察而不是试验；资料要从现实的始终获得，而不是从更多地控制实验室的范围来获得。

这种田野考察的一个设想是：文化人类学者要注意一种文化的内涵，要注意到文化（生活方式）的使用者如何看待，如何反应和问题是什么，以及外界的观察者又如何看待它的这些问题。因此，他的分析能够考虑内部势力、外部势力及其影响。深入田野考察的另外一种设想是：人类学者集中研究对文化有意义的那些行为类型，而不是研究可以用合适单位来衡量的个别行为。他寻求活动的有规则顺序，注意他们在各种范围内如何变化，他观察形式是怎样由于参与者不同，以及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而相互有别。尽管一个文化人类学者可能会使用调查表和其他手段来详细说明统计资料，但是他的基本目的往往还是要确定行为的规律和它们中的主要差别。当他得到了这些粗略形式以后，他就能更好地判断哪些统计标准可能有意义，如何尽力地去搞到它们。

比较法

比较法在分析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起作用。例如：当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研究印度的一个村庄的社会结构时，他发现乡村居民怎么把自己组织起来，然后比较这个村子的不同的群体，来确定他们当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既然乡村居民是按照种姓群的教阶组织来划分等级，那么比较任务之一就是看一下在所有的种姓划分中哪些作法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了解了相同和不同之后，这个田野考察者就可以把这个村庄的整个组织形式和附近的其他村庄的组织形式加以比较。这样的比较能使他又一次勾画出村庄间的或村庄类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也能说明乡村居民过去的一些行为，谈谈他们对于将来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反应。对印度不同地区村庄的组织形式的比较可能有系统说明，印度文明中广泛存在的一般特征。反过来，比如说，这一点也能把印度的村庄里

的种姓阶层和日本或美国的某些地区的社会阶层进行交叉比较，从广义上来分析，这些比较会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一般属性中提出社会阶层的问题。

分析的各种标准都利用比较法。因此，如果正在考虑的问题是：是否最早的文明起源于相同情况的生态学和工艺学，那么几个早期的文明要加以比较，以便看出是否有什么相同的情况存在。如果这样，我们会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发展全部过程的了解。如果没有相同之处，比较的过程还会提出一些有用的看法，以便在进行同样的比较法时，进一步得到证实。再比如，为了了解从独立的或者从属的经济到现代工业化的国家的转变，我们查阅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发展（包括社会的，宗教的以及经济的变化）的档案。

概念的发展

最后，这里存在着不断地概括文化人类学者工作的特点问题。他们倾向于从实证出发建立他们的理论，倾向于从他们看见人们干的事情，听人们讲的东西，或者从他们从地下发掘的过去文化遗物来建立他们的概念。选择某些真实部分以供观察，对民族和资料提出某些问题的时候，文化人类学者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提供了已积累的理论并受其理论所指导。但是，文化人类学者不可能象其他的社会科学家那样，以一个典型或一系列抽象的命题开始，并把他的田野工作限制于验证这个典型或者命题上。他更倾向于从基础开始，而不是从抽象公式出发反过来验证。

同样，选择出来供分析的理论性问题有可能是由正在研究的民族情况和问题而设想出来的。文化人类学者不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概念而典型地观察民族，而是为了了解一个民族——和所有的民族，尽量地整理出他的概念来。因此，当他发

现原来的概念不适于解释他所观察到的重要的行为过程的时候，他尽力去调节和验证一个新的概念。这样做，有利于使人类的共同品质和他的研究课题一致起来。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经写到：“要能知道祖尼印第安人对什么感到羞耻，必须首先懂得什么叫羞耻”。（1962—1963第一卷第54页）

文化人类学的很大部分，基本上存在于人文主义成份。不仅需要研究一个人群的艺术，还要研究美学成就中最低水平的和最高水平的那些艺术。同样，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一个人类学者还要尽量从内部以及外部来观察某种文化。作为一个直接的观察者，他经历过他所观察到的某些生活，他的亲身经历能够说明他研究的课题，所以，他们又带有人文主义的内容以及科学的客观性。由于生活在他分析的那个群体文化的人群当中，人类学者能够描述他感觉到的倾向和矛盾，研究他想达到的预期目的。在与他的助手一道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具有既主观又客观的平衡态度。过于主观就会导致偏见，过于客观就会看不清社会的现实。另外，赞赏和洞察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类学者完全地扔掉他自己的文化价值。一般说来，他能够从更大更宽广的角度来观察那些文化，因此，他能够从一时狭隘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但是，他没有必要否认自己的群体，甚至于保持自己的不同观点。例如，人类学者，当他们了解了科学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象科学葡萄园里的任何其他辛勤劳动者一样，热爱科学的价值。

评价一种文化内部情况的时候，人类学者会评价观察者在分析文化和社会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他征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不同意见。他们对他社会地位的评价会影响他们的反应；他会发现同一个人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他的观点。这一点对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来说，多少是

真实的。然而，还是存在着在变化的情况下需要认识的客观现实的稳定性。因此，他必须能够改变他视野的角度——有时候把村落看成为主要单位，有时候把它看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实体的一个部分。他必须把村落描述成稳定的、不断发展的制度，然后，把相同行为的不断变化和历史的一部分来分析。极其重要的是，他必须尽量地调节不同的角度，这样，他才能从研究不断地变化中，及时地总结出其经历时期可能是真实的某些概念；这样，在分析一个比较大的体系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个体系的组成群体的意思描述成为比较小的体系。

这样的任务需要在不同标准的分析上加以概括。研究某个专门性质社会的人类学者，可以用更直觉的方法，利用他的观察和实地参与获得的资料，以摘出这个社会活动的总的形式和功能，比如，在婚姻礼仪方面，这样的事实对他也有帮助：他所研究的课题虽然没有必要非常精确，但其概括也能为他提供已经摘录好的资料，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另外一种分析，他把一个文明地区的婚礼形式加以比较，以便了解是不是不同的描述会一起反映出主要的思想和行为形式，它又是那个文明地区的人群共有的。用更为抽象的方法，他将这些社会仪式的存在的地域，形成概念，并根据所能得到的大量的比较资料，用以对它们加以证实。

方法问题

下列的比较原则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自由区划的整体研究避免了专断障碍，但是，它也需要不断地重新建立所研究的框架。无拘无束也会产生约束。从思想和行为的外表来看，强调形式已经在标准和详细分类方面满足不了发展人类学的概

念所要求的那种精确性。正如克莱德·克拉克谟指出的那样，文化人类学者对其字数总是非常随随便便的。（1959年，第259—261页）。他们从来没有正规地就他们的数字和观察种类提供出合适的资料，他们的概念又是基于这些数字和这类资料的。他们总是倾向于把没有文字的文化比实际存在的文化估计得更均衡些，强调行为的主要方式，忽略不同的以及相反的表现。

田野考察的收获也带有一定损失，自然历史发展程序使观察者粗略地描绘了其存在的东西，当他发现并按照这些事件先后来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更重视描述，而不重视分析，重视传授同种类的资料，而不重视建设那些条理清楚的有比较意义的资料。在利用这种程序时，人们可能会无视意义重大的基本势力，因为这些势力没有在粗略描述文化这些方面出现。呆在一个人群里一年左右，就企图接触到某个文化的许多方面，一个人类学家必然不如一个农业专家对于他们的农业说明的那样详细，或许不如一个音乐研究者对音乐那样有远见卓识。同一个人类学者，由于其他观察者的反复研究和集体研究，对同一个人群的多次实地考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就一个研究方面来说，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比起大多数社会学者来说更庞杂而不深入。

在进行文化比较的时候，在方法论的评价方面同样地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从研究到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和参考的主体略有不同的时候，当外表面不是精确的标准决定类型的时候，往往不容易判断假设地比较行为的两种资料，是否真具有比较意义。用继承下来的抽象方法，从观察到的资料出发，建立理论概念的倾向还会有其他困难，这里还存在着从最低级的抽象向着最高级的抽象过速跃进的诱惑力。据说，

人类学者是社会科学的天文学家。这个角色因为有这样的事实而复杂化了，即到目前为止，当他们亲自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搜集关于世界人类资料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当成全然是天文学家的样子而包罗万象。

认识这些困难，人类学者不断地努力改进他们的方法，然而又注意哪种方法废除了，哪种方法产生了。因此，他们认为：为了解释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所进行的精确的田野考察弥补了由于按照真实经验而不是按照实验室掌握的情况来研究行为所产生的不严密性。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对于了解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实验方法也有它们的局限性。同样，统计资料对于某种分析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对于其他方面来说不那么精确。抽象调查可以比较精确地预示某些有限的经济倾向，但是在理论问题方面，同样的办法，对于宗教信仰的结构和文化的实践来说，不大可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关于这样的问题，宗教的忠诚和行为形式是极其重要的，宗教实践的一部分对于有关的其他部分和制度的关系都需要考验，人们才能对信仰的某一点进行确切的测定。

正象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与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有着主、从关系，文化人类学者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也受到限制，并由它们的主要方法来主宰。使用这些方法确实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结果——这种结果并非主要地由其他的行为科学所提供，在对了解人类行为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贡献，文化人类学者找到了对于他使用的方法的基本的验证法。

文化人类学的成就

几方面的文化人类学产生了大量的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一个简单的成果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主要文化的大纲，已经

草拟出来，其中很多仅仅是最初的草稿；有许多这样的地区，我们仅仅占有非常贫乏的资料，而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家的观察。然而，人类文化的主要方面还是能够被辨认出来。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整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也不同，正象伦常禁忌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不同一样，并认识到了在每个整体组成部分内部不同的差距。因此，一种文化的伦常禁忌只能应用于几个关系上，在另外的方面，这些禁忌可能包含有社会地位的内容。艺术形式可以根据媒介物的不同来解释，虽然属于一种文化的人群选定一种艺术形式作为美的享受（比如说精心设计的文身），可是，另外的人群却鄙弃它，就其本身而言，或者根本不懂。即使是这样初浅地描绘文化，也可能对学者们有所触动。他们一旦认识到，每种文化都值得认真的研究，都存在着大量的变异，那么，自身形式的不同就没有必要被当成为是对自己伦理标准的威胁。即使初步地利用文化这个概念，也能表达重要的意思，反过来，这些又可促进深入探索，深入的探索会把一个学者带到由文化这个广意的概念所开创的知识和研究王国里去，为了深入的探索，这个广意的概念必须以更特殊的方式加以发展。

人类学概念的这种发展，产生了两种主要的成就：一种是把文化视为制度，即视为是活动和人群组织起来的、内部相联的模式；另一种是关于文化的发展用有规律的方式使文化制度得以改变、适应和发展。那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系统化的分析上的社会人类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样的问题：亲属关系和婚姻过程、矛盾与困结的关系、宗教与社会活动的相互转变等。大部分的这种分析是建立在观察非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小规模的部落社会上。数以百万计。考察复杂

文化发现物要在数以万计的人群中进行，使这些概念的结果得以精炼是大有前途的，但对于从事对照史迹年表的研究还是严峻的挑战。

更大范围的分析研究是文化生态学，其中，某一个文化和社会的体系被看成是始终在与较大体系（包括人类和自然两方面）进行着相互转变。（斯图尔德，1959；塞林斯和塞维斯，1960）。另外一种方法是按照语言分析的模式，研究在一种文化内部使用的思想、范畴，比如说，亲属关系、神话、礼仪等。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同文化的一个专门项目，例如，在对于宗教或工艺学的交叉文化研究中，老早就被用来确定行为的坚定的核心和大量的变异，最近，增加对价值的比较研究，也就是，努力说明其基本轮廓和属于一种文化的人群所进行的选择，与各种文化价值的并发体一起以比较研究（克拉克洪，1959）。

心理人类学研究（也叫文化性格研究）与分析某种文化有关系，不管是作为一个保持着的体系，还是作为一个在变化着的体系，还是发展的生活工具。文化结构是由人来维持的，而这种维护力为人们所共同衡量的认识力和性格形成。因此两个社会，可能会保持着同样的文化形式，就是如此。如果每个群体对于权威都持不同的态度，或对于平等主义都有不同的评价，那么执行起来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反过来，制度，很明显的，不同的教育制度，对儿童个性的发展就会有不同影响。不同制度、不同影响都会起作用；在全面分析一种文化的时候，对不同者都应予以考虑。还有：文化变迁是随着个人和一群人日常行为的改变而改变的。人们选择这些改变，而不选择那些改变，并不是不与他们个性的特点有关系的。当文化的某一个部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的时候，这个

改变的反响不仅触及到这种文化的其他方面，经常给以亲属关系以新的内容，或者又一次对宗教的强调，而且可能影响在那个社会里形式的个性所依据的规矩。

为了研究文化的成长，人类范畴内所有的时间、距离都要包括进去，从小的、有限的改变到对人类生活（如生物和文化进化的一个原因）的所有方面都要去认识。当文化人类学者开始研究某种文化是怎么样形成的时候，他们的印象只有来自那一个社会的一点点东西。一直存在着一个群体从另外一个群体借用其文化成分的事，既使相互为敌的那些群体也是这样，甚至它可越过可怕的地理障碍。这种被称做“传播”的过程发生在文化历史的早期，而现在又大大地加快了。对于这种传播还是存在着限制和抵制的。分析支持文化传播和阻碍文化传播的条件，在研究文化变化中，是个中心问题。和这种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一种文明内部，发明和创造的条件问题；这些发明和创造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被接受的问题。

文化变化的速度是这种调查的另外一个方面。考古人类学的发现表明：变化的幅度一直在加快，至少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是这样。虽然人类控制力的加速发展能够表示出来，但是，并不是文化变化的所有方面都是以同一种速度在发展，也没有明显的证据来说明象婚姻、亲属关系或礼仪的形式等问题上在不断的发展。

从人类进化的观点来讲，在人类生物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在生物进化还在进行的时候，文化就开始增长了。据最近的发展来看，当人类的生物先驱开始具有文化萌芽的时候，这种能力就使人类体质进化朝着人类方向发展，因此，人类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类型最能看

清，它并不是限制利用给人类共同美好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意味着发展和承认人类的潜力。

从某种意义来讲，人类潜力已经成功地出现，因为文化的新开端已经到达，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文明、科学已经发展。一旦社会到这样一个开端，许多新文化将会向它的人群开放。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必须同时越过这个开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方法开拓这些潜力，但是，一个人群到达了文化的分界线，必然会使全人类共享它的结果。因此，当前新兴的国家迫切地要求发展经济，应该当作当前文化进化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初叶产生的文化人类学里，文化进化的意念很突出，但是，这种意念只是作为每个人群必须得经历的几个阶段之一而提出。这些阶段的合理性，特别受到那些意识到传播的重要性的人的反驳。他们宣称：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各个阶段所需求的典型特点，在根据民族学资料进行分析的时候，并不真实。传播主义者把重建某些文化历史，特别是原始民族的文化历史，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相反，他们的作法受到这些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不是提出猜想的历史，而是阐述文化里的相互的功能关系和社会的基本原理。在轮到他们的时候，人们批评先驱的功能主义者，在调查的焦点、设想、文化每个部分间的有机相互关系中，都过分地固执己见。

尽管每一种倾向的提议者，在批评他们的先辈时，似乎仅仅对太简单的概念给以过分简单的驳斥，但所有这些思想倾向，都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趋势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文化人类学的每个部分的活

动都空前活跃。先前人类学者不太注意的民族，特别是复杂社会的那些民族，在深入的研究了某些乡村和邻居的时候，被详细地描述了。过去从人类学方面很少予以研究的问题，例如，法律或领导，已经被较好的探讨，我们对于标准的人类学专题，例如，亲属关系等，都加深了认识。

文化人类学所有部分的基本原则也不断的发展着。埃里克·沃尔夫已经指出，人们总在强调总命题的体系，对那些更具有浪漫色彩的方法，其不稳定性和摸菱两可的解释也在不断的削弱。文明和具有文明特点的民族，一直受到文化人类学的重视，而这种主题也在增长，不过较之着重小型的、原始的。没有文字的社会仍是属于第二位的地位。它特别强调人类人灵和社会的永存的特点、强调每一次变化的局限性、强调社会生活中必然的需求。人类的潜力是灵活的，而有些文化人类学者原来认识到的还不那么广阔，那么开放。文化相对主义保留着搜集资料不可缺少的条件，人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到是否对其正在观察的生活方式合乎逻辑的作出判断，会干扰他们的观察或者给他们的观察增添一些色彩。暂时有价值的判断也是很明确的。每个人或每个社会都得采取某种道德标准，以便发挥其功能。

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围为有一个新的论战。这个论战是由功能主义观点的倡导而提出的，某些继续坚持这种观点的社会人类学者也没有抛弃这种论战。这种论战仅仅是；没有一个分支能很好的涉及到文化人类学所声称的那么广大的范围；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范围不可避免的削弱了人们掌握的某些有用的课题，伤害了那种对于科学地使用成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深入的调查。这些论战并不怀疑语言学、考古学或是进化论研究的科学正确性，但是他们发现尽量的保持与上述领

域联系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联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也没有了什么了不得的坏处。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发现，研究当前的、小型的社会，与集中于社会关系的研究相比，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来说，是够充分了。

然而，虽然文化人类学的广阔范围有时确实阻碍了更好的深入研究，不利用社会人类学工作的成就。他们认为，存在着缩小范围的可能性，存在着适当扩大战略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打算抛弃宽广的策略，因为这个策略能使他们从一种水平的分析向另一种水平的分析转移，从调查的一个范围向另一个范围转移。这样可能会对他们掌握的某一个课题持偏见态度，但是，这样会使其智力灵活展开。就是这种灵活性可自由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文化过程在一个时代分清了，或者在另外一个时代文明是真实的；对于文化的微观研究的发现，怎么能适合于对文化的宏观研究，这对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有用的成果。

参考书目（略）

原作者：戴维·G·曼德尔鲍姆
华中师范学院 邢文藻
中南民族学院 刘孝瑜 译校

译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68年版第一册

Ⅲ 社会人类学类

社会人类学的宗旨是，通过对于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来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的不同；分析尽可能广阔的社会进程。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基本是那些标准化的和制度化的关系，也

就是，人群作为某些社会群体或范畴的成员，与之有正常关系的那些社会关系。典型地说，这些制度是，家族、婚姻、亲属制度；经济和政治组织的结合体；社会控制（包括法律）、道德、礼仪和宗教。在任何社会分支里，对于社会关系的“解释”也不会是最后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由其他的资料来供给，例如；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的资料。但是一个社会人类学者是通过确切地解释和描述行为的联系，来了解其中的社会关系。一个奇异的习俗，比如，“开玩笑的关系”——其中某些指定的亲属范畴不仅进行胡闹和无节制的放肆，而且希望这样做——“解释”到一定的等级，也就是，当和那些“回避”的习俗相对抗的时候，解释是比较可以理解的。这些“回避”的习俗表现出其他亲属范畴以极大的尊重，甚至于避免一切接触来解释。这些平行的但是相反的行为方式还“讲得通”（特别是在对一定社会范围加以比较的时候），比如，对于可能处于不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结构和运用关系的亲属范畴典型的论述方法。普鲁里亚行为类型详尽地描述了亲属关系的结构，也沟通为相抵触的限制。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组织，以便它有效的完成社会任务。

社会人类学者一般概念的解释和他的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与社会学的同行们使用的解释和方法大致相似。（习惯上，人类学者都与“原始的”或非西方的社会有关。）虽然他的方法有某些方面的不同，但是，都用整体方法来研究。社会人类学明确地承认，行为对于有关制度的相对系统化类型来说是固有的。这个功能上相互有关的概念，（其他社会科学也这样认为）以他本人在较小规模社会方面的田野实验，有力的展现在社会人类学者工作面前。在某些比较小

规模的社会里，观察者都了解到了每个成员本身。

历史：制度化社会关系的比较法研究在理智地探索历史中，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赫罗多塔斯的理论内容，可能被过高的评价了，但是，蒙特斯鸣、奎伊尔、詹斯·克拉夫特、艾萨克·艾斯林和亚当·弗格森是关于早期的坚强的思想家典范。社会人类学还仍然求教于他们。早期描述性的民族志传统，举例以明之：J·F·拉菲陶（1727）关于休伦族研究，Garcilaso de la vega（b.1539—d.1616）关于印加族的研究和詹姆斯·库克（1768—1775）关于中、西部太平洋民族的著作里，对于建设社会人类学也作出了贡献。社会人类学的很多思想都是从H·梅因、J·J·巴荷芬，特别是L·H·摩尔根的理论著作中派生出来的。后来，J·F·麦克伦南和C·N·斯塔克关于家族和亲属关系的著作，E·B·泰勒、W·罗伯逊史密斯和J·G·弗雷泽关于宗教的著作，概念地和分析地影响了正在兴起的分支，基本的贡献还是来自于E·杜尔干和他学派的追随者，这些人为《社会学年报》杂志撰写稿件。大部分兴趣放在探讨人类习俗进化和历史结果，但是民族志研究和理论集中的影响，引起了它为现实的研究。美国的F·鲍亚士和英国的A·C·哈登发起了系统地有计划的远征性田野考察。二十世纪初，民族志研究使我们了解同一年龄的人们和性别的组合，亲属和婚姻、以及原始法律都作出了贡献。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也从物质上为民族志记录作出了贡献，利用并鼓励了比较理论学家。R·H·罗威的《原始社会》（1920）是第二次以系统的，理论的方法搜集了很多关于社会人类学材料的书。同时，A·R·拉德克利夫·布朗（1922）和B·马林诺夫斯基（1922）——他二人把高度的理论训练和观察力结合起来用在广大的

田野工作上——正开始建立概念结构，以便对当前的制度作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这种研究渐渐地被称为社会人类学。

当代的社会人类学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主要是强调功能主义。这里，一个明显的对比是，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人类行为的生物基础，虽通过文化，但是，它从根本上变了形，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对于功能的理解，因为它与社会需求，较之个人需求更加相关。（拉德克利夫·布朗，1952）在强调社会结构的同时，他还强调社会结合和社会平衡的概念。这后一种设想，因为有可能否定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批判（利奇1961）。还有，拉德克利夫·布朗坚持在控制每个人行为的制度因素是第一位的观点似乎是过于生硬的结构决定论。且莫论对于这样的功能和结构设想的正面评击，连最近更加有意地触及有关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论的问题。

当代对于模式现代着重点的兴趣：在结构中的当代重点采取明确地树立模式的形式。对这种发展的着重点可能是受到实用数字的影响，例如：在力学方面；或许也受到经济学家当前利用的影响。E·R·利奇（1954）对于亲属关系的研究在Jinghpaw亲属关系术语研究中表现出来，在这种关系中，他按照七个结构原则构成了一个设想社会，而后，展现出，Jinghpaw及其复杂体系，可被看作为这个非常单纯形式化理论方案的修改。他称这篇论文为民族志代数学试验，可能是由于记住了这样一个笑话，即马林诺夫斯基、比拉德克利夫·布朗、澳大利亚亲属关系图表要高级。然而，社会人类学者特别对于C·利瓦伊——斯特劳斯（1949）的扎实分析感兴趣，特别是限制性和一般性互换模式又被运用到亲属关

系和婚姻关系上。用发展了的模式结构包括抽象的高级阶段和建立起一系列抽象概念，以达到启发式的目的。这个理论影响作用，从这种方法得到阐明，特别是用在亲属关系方面，为它本身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模式理论，“变戏理论”，被F·巴思（1959）以更为有限的方式用于“帕坦”社会的政治组织里去了。巴思指出：从实际生活过渡到变戏理论模式在于规则的形成，社会成员用这种规则来指挥他们的行动。这里包括高度的、极其重要的抽象。在选择和规定内容来控制这种模式的时候，分析者本人做出的专门选择对于最近的说明是极点重要的。这种方法是根据经济问题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于几个“队员”的运用。当人们把它运用于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就需要高度的简化。

社会人类学者对于模式概念的使用，涉及到很广的范围（社会人类学者学会，1965）；在分析家选择材料以供研究的时候，用不定的或不显明的东西去承认个人偏见。现代人类学的特点是其自我意识的。很明显，在观察者的形势下的个人的成分被看作会影响他的材料的搜集的，包括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正在研究的那个人群的行为。分析家在处理这些材料和他与这个人群间的关系中的态度，可能会决定他献身于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形式。

社会过程的分析：在进一步把结构研究概念化的同时，产生了对分析社会过程的更明显的注意。关于过程的争论一直在进行，这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该社会法律规定，或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而被理解了。关于社会结构概念是否主要用于总结规律或总结行为，是否它只涉及思想的和统计数字的准则看法还不一样。但是强调定义和实际是两者都需加以研究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社会过

程研究，集中于下列这些问题上；家族内的发展周期、规定的婚姻规则、婚姻的稳定性以及居民和血缘的关系等。母系制度亲属之间关系不同和改变，已经被多次的用比较法研究（伊根1950；施奈德和高夫1961），而单系血缘群体的结构一直在予以精心研究（福特斯1953）。这里与血缘群体的定义有很大关系，以致以祈愿的方法而不是以明确的证据来承认全体成员（弗思1957）。容许单系成员规定有这么多的例外，是否这些单系的是父系血缘群体，或者是否他们是以父系血缘为重的非单系的群体，这还仍是争论的问题。但是，在血缘本身的概念进一步澄清以前，这个问题不可能由田野调查来解决。

在政治组织的范围内，很多分析表明，有机的社会、经济和礼仪关系，包括在权力的斗争和生存中。对这种斗争学说一直存在着一种着重点，提出局部制度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全面的结构（格拉克曼，1956）。这种斗争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强调。或许也可以归功于关于侵略恐怖作用的心理观点。按照社会法律的分析，合法的问题——包括与自杀和他杀有关的问题——已被纯化，由于研究了市场作用和联合协作这些经济制度，这些问题也就清楚了。在礼仪和神治方面，也对这个制度进行了其他功能的分析。对于关系到一千年来经济和政治情况变化的重点研究，受到了历史学家和其他分支的社会科学家的帮助和激励。

无疑，当前研究社会过程的大部分的倾向性要归于发生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社会里的，大规模的和不容倒置的变化，这些社会一直是社会人类学者关注的地方。但是，鉴于早期的“社会变迁”倾向于单独作一个研究的领域，现在已经认识到，变化着的情况上人类学者资料范围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现在，用比较精确的形式，重新呼吁把研究历史当作社会人类学者工作中合法的和实际需要的一部来看待。

包含在解释因果关系中的哲学问题一直被忽视(纳德尔, 1951)。有些社会人类学者，特别是美国的，并不满足于制度形式上互相关系或伴随变化的迹象。调查对现存现象的先前情况，以制度为什么和怎样存在和起作用的方式提出问题，导致越来越精确的系统地阐述。除了从文字材料和口头传说得来的历史遗留物的迹象以外，一直想说明生态学因素作为制度发展的条件的重大意义。概括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例如：政治制度和存在形式间不明显的，广阔的，相互关系的排列(沙佩拉1956第219页)。然而，根据文化的进化，更有力的关系也被提出了。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一个主张，即努尔型的父系社会是掠夺性扩张性的一个单位。(萨赫林思1961)。然而，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怎样对待历史范围的问题还必须加以足够地解决，各种各样的关于部落传统的可能性的设想，在解释被完全地接纳下来以前，必须予以更充分地考查。

崇拜形式研究：最近几年里，社会人类学者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崇拜形式。S·F·纳德尔(1951,第261—264页)特别注意研究崇拜行为的需要。特别是在几个有关的主题范围内，描述和分析一起在进行着。例如：分析巫术已经指出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结构紧张有着崇拜的一致。这点发生在有姻亲关系的家族里就看的更清楚了。图腾制度的研究表明，在非常稀奇古怪和不关紧要地选择某些东西作为崇拜的情况下还有正规的思想。特别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已经探索了神话的信仰，他根据所有可以搞的关于神话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的文本，以比较法分析所有的组成部分，深入地

表明人类思想的有重大意义的模式(1955)。E·R·利奇(1954)争辩道:礼仪是崇拜性,它与社会的结构和价值是没有用语言表示的行为的一种形式,这种行为与用语言表达是一样的。A·I·理查兹(1956)说明了可能用女子入社的仪式来表示出来的崇拜复杂性。

人类学对于“原始”的宗教制度的制度研究多得很,分析象“牺牲”这样的活动,象“神”和“精灵”这样的概念,对于我们了解它们的复杂性和深奥微妙性是有很大帮助的。(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1956)。对宗教制度的研究,比多数其他领域中更明确地能表明,社会人类学者工作中的基本哲学设想与之不同。有些人采取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把所研究人群的宗教概念和行为当成基本上是人类的思想产物,作为对它们社会和经济存在的一般和专门问题的回答(弗思1951)。另外一些人类学者从信仰者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宗教现象的个别的或绝对的特性,把他们所研究人类制度当作普遍真理的特殊情况(埃文思——普里查德,1956)。

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社会人类学者的特点倾向于追求内部特征的田野调查。他通过使用所研究人群的土话,把参与社会成员的某些事务活动和通过询问观察来搜集材料结合起来。任何方式都不能把社会人类学者与他在其他社会科学的同行绝对分割开来,但是,这种结合为他提供了典型的“草根”方法,(译者——以草寻根,或草根并重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与他自己不同而密切相关的社会经验。

社会人类学者深入田野的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困难。观察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有时就缺少对历史的敏感性。当他们偶然运用相对比较短时期的人口统计学和生态学因素的时候,

这些制度就会描述成为永久的。对社会形式变迁趋势的感觉就会困难，并受某些错误的支配。有些社会人类学者，部分地为了满足这些问题的需要，部分地希望再显示他们比较科学和美好有兴的经历，在几年以后，又重新转向他们原来研究过的社会。另外的一个社会人类学者用不同的形式重新研究他早期调查的那个社会。这种“反复分析”提出了下列这样的问题：在他们进行重新研究以前允许花费多长的时间；用什么标准来证实过去一个时期的相同与不同；这些二元对照史迹年表的关系是全面史迹分析研究，反复研究，为在社会变化和有影响的最敏感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单靠报告的需要性就意味着个人必须直接地与所研究社会的成员接触。这使继续密切研究而确定选出人群典型的代表性就有困难。在人口极少的社会里，这样缺少足够的典型，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在有几十万人口的社会里，比如某些非洲的部落，尽管已经致力于搞出不成熟的典型，但是人类学的研究还不得不认为是同类，而不能证明其代表性。所得到的证据没有多大的偏见，随便碰到典型的简单化作法也没有必要。简单化不能提出更准确的资料，也不能说有很多所需材料的错综和敏感特点。与此问题有关的是要得到有用的大量精确材料。自W·H·K·里弗斯（1910）以来，社会人类学者一直自由地使用地理学调查方法来得到关于亲属关系结构、称谓、婚姻典型等等资料，这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直到最近，社会人类学者还喜欢根据很少的几个例子，或根本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例子的范围，而用一般的术语来说明社会成员的作用和行为方式。现在，在这些领域内；家族组成和居住的形式、交换、土地占有和政治联盟等概念化一般还是由分布的特点来证明。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一种被

广泛使用的技术是社会人口调查。

需要研究的方面：要指定社会人类学多么需要调查的区域是困难的，因为它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较年轻，需要发展它的每一个领域。但是，看来某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原始”民族文化在某种情况下，体质——的迅速消灭，要抢救这种将遗失的文化，要求用巨大的精力来描绘出尚未很好地研究的那些民族的社会体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学紧急研究委员会已经开始起草这种研究的地区计划。）

还需要对亲属制度、家族的形式、居住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进行高级的比较研究。这个领域是社会人类学者的杰出的领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比较亲属关系方面有什么本事。在宗教方面，一大堆民族学的资料还等待着进行更严密的理论分析。不仅要求对某些原始社会的宗教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要求与哲学家、心理学家、当代的理论家更密切的接触，这样，提出要解释的那些非常困难的和棘手的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处理。

在政治人类学方面——它与人类学研究法律和社会控制有关，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稳健地向前进了（社会人类学协会，1965），特别在研究没有高度集中的制度方面。对于不同于政府结构的政治和行政职能要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与政治科学家合作是可取的，特别在研究政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结构和活动方面，这项工作更为急迫，讲求高效，与经济人类学的协作，很有必要，因为传统的政治体系正快速的要被取代。受过有经验的田野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理论分支方面训练的人必须构成以利用和解释社会总论的主体，这个理论主体主要是由经济学这个老的分支里派生出来的。对于刺激生产、作为社会以及经济过程的交换、农村

资本和信贷的使用，这三者研究的重大意义开始在经济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受到赏识。这些成果与粮食经济学具有实际的而又有理论的关系。与他们要求大家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概念紧密相关。当代虽然社会科学没有必要仅仅通过它们号召的实际应用来为它们自己炫耀，但是，它们越来越多的显示了它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上的效用。人类学者与公共卫生行政人员合作前途是无量的。社会人类学对更广泛地了解很多种社会关系、家族结构和其作用的特点、在工业的和非工业的社会里亲属关系的重大意义方面作出了贡献。它的总的判断和生产价值可能相当有限，当应用于分析某种社会小的团体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并说明需要有一个更敏感的，更从全局出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关系。这点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人类学者非常过细的分析怎样才能转变为大规模的分析。在这方面，社会人类学朝着采用更多的统计程序——正如社会学家现在使用的那样——前进的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书目：（略）

原作者 雷蒙德·弗思

华中师范学院 邢文藻

中南民族学院 刘考瑜

译校

译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 1968版第一册

IV 应用人类学

取名叫应用科学的研究，与建立在承认科学原理的基础上的技术有关。最熟悉的例子是工程学，它运用过物理学原

理和医学生物学的原理。工程学的学者们学会运用科学原理来作功，以便能经得起他们可能遇到费力的事情。医学家们学会运用科学原理来解除人体的疾病。每个人都关心他要达到的，有限的和选定的目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选定的目的。当某个工程师被雇用去建设一个大坝或一座桥梁的时候，某个人已决定，这是某一个地方所需要的，他就没有必要再问是否从某种价值考虑，一个人工湖或者把河的两头都堵住是合适的。当认为自己有病的病人来看医生的时候，这个医生不要——确切地说不必——考虑治好病人是否正确，他必须考虑哪种方法最好。

社会人类学与整个的社会关系有关。社会人类学和工程学的相似处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人类学应当描述建设社会的**技术**，这些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合适的，社会人类学和医学的相似处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人类学应该描述如何治愈社会的病态。但是在社会人类学里，没有象工程学和医学方面那样要考虑什么是合适的或者病理的那样一致的意见。

范围的含义：有些社会人类学者一直想建立公共卫生卡片。有人建议：健康的社会，这个在科学上有有关的概念。可以根据有关因素的极大平衡来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类，都可认为是相互有关的，都可认为与组织起来的社会有关。这个社会可以被看着有对于进行着有效变化的环境背景作出反应的所有东西（汤普森，1960，第773页）。这是提出问题的公式，而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公式。

还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制度变化研究而就是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按照埃利奥特·D·查普尔的说法，“应用人类学应该看成为是人类学

的这个方面，即关于描述人类关系，和控制着这种关系的原则的个别变化；这个方面还包括研究限制人类组织变化可能性的那些因素（查普尔1953，第819页）。

应用人类学的范围，实际上被当成为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只要对人们作出一致的决定，来了解关于他们人口问题是有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人类学的范围早就用以研究隶属于欧洲人统治的非欧洲民族的习俗方面了。

英国人类学者要把他们的知识用于实际的第一次提出是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南非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人类学皇家学会向负责殖民地的大臣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南非各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记录下来，以便为开明的统治政策提供基础。据信：这可能会缓和这种瓦解，这种瓦解一般是由于接触了比较先进文明的那种原始制度引起的。（约瑟夫·张仙伦先生回答说：南非新殖民地的官员过份地忙于“大量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殖民统治中的人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这段时期，人类学应用的最理想的方面是统治殖民地人民。尽管不同的殖民国家就被奴役的人民怎样才能更快的西方化。西方化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一致认为适当地尊重他们的传统习俗是必要的，这种习俗可以调节社会地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九二六年以后，人类学的研究，也就包括为英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训练行政官员。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就调任这种官员充当政府人类学者的职务。这样的职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澳大利亚属地和英埃苏丹都设立了。在坦噶尼喀进行了应用人类学的深思熟虑的试验，在试验中，人类学者把他的研究指向回答行政官员提出的专门问题；答案

在《人类学应用》上发展（布朗和赫特1935）

《研究重点》，在黄金海岸的北部属地，迈耶·福特斯，根据政府的要求，写出了泰村西（译音）婚姻法（1937）。我们感谢黄金海岸的政府人类学者R·S·拉特雷，他为我们写了几卷关于阿散蒂的民族学，和关于黄金海岸北部属地的书（1923，1932）；我们感谢尼日利亚的政府人类学者C·K·米克，他研究了朱肯族（译音）（1931a）、伊博族和北部尼日利亚一些比较小的民族（1925，1931b）。H·E·威廉斯发表了一些关于巴布亚民族的研究论文，包括一篇“排外主义”运动的论文（1928，1940）。这种研究报告不仅描述了当地的制度，而且尽力说明引起当局关注的骚乱；尽力提出补救办法。在这方面，它和现在应用人类学所持的概念相接近。

除上述的之外，这些人的工作限于描述当地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它所以被称作应用人类学是因为研究人员被政府所雇用，这些政府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地维护当地的制度。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英国政府当时认为：用他们传统的地位这样一个长处掌权的人是政府政策在当地的最好的机构；这些人很想知道谁是合适的人，或者哪些人是合适的人，这些人又被其他人承认是“当地的权威”。一位比利时应用人类学家，曾经把依靠传统权威的政策描述为特别受到某种社会阶级的动机所鼓舞的政策。他写到：间接的统治是想用通过它自己制度和领袖人物中间人的方法影响这个社会以避免当地社会的瓦解（尼凯斯，1960，第112页）。在训练比利时和荷兰殖民事务新成员时，他们把比英国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民族学和习惯法。但是，总的说来，它更多地涉及传统的制度，而不是当前变化的过程。

“非洲语言文化国际协会”（现在叫“国际非洲协会”）于一九二六年建立起来，为的是促进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这些创建者，被当时非洲社会变化的迅速所驱使，而且认为：这个应该成为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的一项科研项目。

当该会于一九三二年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扩大其研究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原始非洲社会的结合因素，了解当时新影响和组成新集团的倾向，用什么方法对这些因素发生影响，并了解新的社会结合是怎样形成的，非洲社会和西方文明间的合作是怎样形成的（国际非洲协会1932，第1页）。

“这些问题，”该协会说，“对非洲各民族本身、行政管理人員、教育者、传教士、殖民者和贸易人員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1932，第1页）。得到了了解就能使行政管理人員能够促进一个健康的、进步的和有机社会的发展（1932，第2页），所有上面提到的其他者，在这样一个社会，将会发现最适于他们研究目标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应用人类学才真正意味着利用人类学知识创造一种社会的健康条件。该协会把会帮助这些人决定非洲社会制度和外来的政府体系之间的正确关系，教育和宗教都交给以研究非洲为目标的所有的人，包括“非洲社会的当地领导人”随便使用，以便保留教育当中极其重要的东西，保留在消除宗教与非洲的传统，习俗和思想之间的没有必要的冲突当中极其重要的东西（1932，第3页）。也就是说，它希望几年以后，马林诺夫斯基称作为“成功的文化变迁”的那些东西，提供方法（1945，第56页）。所要研究的项目包括：要求有工资劳动的社会判断，外国领主征服的政治制度作用，和学校教育与传统价值的关系。

虽然国际非洲协会作为一个机构没有提出专门的政策，但是，在它的出版物里所采取的总路线是：对于传统制度的了解，应该使该协会能够介绍一些必要的变化，而不会引起没有必要的分离。黑利勋爵就是以这样的建议来结束他的非洲之行的。这个建议就是：英国政府应该提供资金，以便研究与非洲问题有关的所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黑利的《非洲概览》（1938）发表不久，西印度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大不列颠1940）的报告，就敦促英国政府应当拿出资金，使之刺激经济的发展，以便为这个超过殖民地资源的社会福利事业提供资金。一九四〇年和随后几年的殖民局和福利法都为上面提到的两个目的指定了资金。建立了各种专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委员会来为分配研究资金出谋划策。人们期望资金的申请人能够表明：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于他们要求去工作的那个属地政府将是值得的；有些人表示：于以增加属地当局的民族社会结构知识，就是对一个政府有价值的事。

同时，为了评价知识的现存状况，对一些主要的地理地区作了详细说明，对那些特别需要更详细情报的地区，也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说明鼓励把某些研究的重点放在能够给行政问题一些启示方面。

政府社会学者：在这个时期，肯尼亚和坦噶尼喀任命了一些人类学者在政府中任职。经常给这些人以“政府社会学者”的头衔，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受训练或理论重点与社会人类学者训练和理论重点有什么不同，恰恰是承认“人类学”这个词在整个非洲并不普遍，人们认为这个词只是研究“原始民族”的意思。人们期望政府人类学者会注意到哪种更迫切需要的有限问题的解释。因此，肯尼亚的菲利普·迈耶努

力地研究了古西（Gnsii的译音）婚姻法，并对限制新郎财产交付的困难作了短时期的研究；迈耶还从他们适合的观点出发，研究了邻居农业合作群的问题，以便采取新的经济行动（1950；1951）。菲利普·古利弗研究了奈机萨（译音）民族的流动劳动和其他社会变迁的作用，这个民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很少受到商业势力的影响（1955，1958）。在澳大利亚，委托伊思·霍格宾去估计在日本统治时期新几内亚人民所遭受到的损失；委托卡米拉·韦奇伍德估计他们的教育需求。

研究机构：由“殖民局”倡议并资助的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这样的机构在东非，西非，中非，西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都有。东非协会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社会结果，研究了非洲的村长级为政府政策的代理人，为什么工作没有成效，还研究了非洲首脑不稳定的地位。后来，该协会进行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庞大的都市化研究工作。罗兹—利文斯通协会在中非的产铜地带进行了都市化的深入研究。西非协会倡议研究喀麦隆发展公司农业方面雇用的各种各样人口情况，并研究移民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西印度协会对家庭结构的研究一直很突出。

比属刚果：在二次大战后至刚果独立以前这个阶段，比利时特别注意人类学的研究。一九四八年在伊丽莎白维尔建立的社会问题研究中心（CEP SI）。一直主要研究与都市化有关的问题。布鲁塞尔索尔威社会学协会设立了一个刚果科，专门研究劳动力的社会问题——旷工，就业和失业的不稳定问题。利奥波德维尔洛温尼姻大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所，于一九五六年建立，设有民族社会学科。该所对利奥波德维尔的人口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进行了不同的解剖——小学教

师、劳动者、失业者等——并且研究了每种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特点，宗教和娱乐活动。

美国的应用人类学：在美国，雇用政府人类学者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当时，根据印第安事务局特派员约翰·科利尔的请求，成立了应用人类学组织。人类学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很好地仿效那个政府人类学者的任务——这个人几年前被派往尼日利亚——来调查印第安的机构，其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机构当作地方政策的机构。其他的人类学者被任命为某一个技术合作组织的顾问，在该组织中农业部和印第安事务局合作来执行改善土地使用方法的计划。

私营企业也雇用人类学者作为顾问。第一次这样的冒险行动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芝加哥西方电力公司霍索恩工程中所进行的那个研究（罗特里斯伯格和迪克森，1939）。人类学者承认：经常在一起工作的任何人中，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也承认对于干扰这种结构的任何意想不到的抵制，都可能影响提高它们效率或福利的设想。一九六〇年以后，在英国科学工业研究部也提倡同样的研究。一九四一年在美国建立了“应用人类学会”；该会出版了杂志《应用人类学》，一九四九年它的名字改为《人类组织》。该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的科学研究；鼓励把这些原则广泛地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它的研究重点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精神健康，研究工业组织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这是上面提到的最后那个项目专门刊物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了。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美国雇用了大批的人类学者来重新安排日本人口。他们还想向部队人员说明被占领地区的文化，这些部队人员要求当地人以劳动者和送信人等的身

份和他们合作。在美国，与在澳大利亚一样（与英国不一样），对于将在被占领国家政府工作的军官训练课程，应包括人类学方面的知识。美国从一九五一年起在它的太平洋托管地政府里雇用了七名人类学者，一名在司令部，每个行政区一名。他们在如何贯彻政府的计划中充当顾问，把这些计划向当地的人民说明，并说明它们的进展情况。这些计划包括，改善卫生，劳动政策，教育、立法措施和司法程序等。还要人类学者进行基本的研究工作，而他们的建议要完全依赖于这些研究工作。

二次大战以来的应用人类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殖民统治几乎完全瓦解产生了政治力量的新平衡，经济上不发达国家的应用人类学的重点就发生了变化。殖民地国家以及很多外籍的人类学者，主要关心它们的稳定，逐渐地变革，因此，用以维持他们本国的制度。他们的继承人决心进行迅速的变革，他们有世界各国的支持，不管他们的思想意识如何，这些国家都更重视技术上的进步，而不重视社会的稳定。政治上独立的人类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些国家人口不断增加所造成的迫切问题，在这些国家里资源有限，生产又低。各种技术专家都在尽力地想出提高生活标准的方法。当要与人类学者合作的时候，正是要这些人类学者去说明在什么地方传统社会准则和制度正在阻挡实行这种提高。

人类学者在很多技术援助项目里被雇用充当顾问，这些项目有的是在美国进行的也有在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中进行的，其中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这些人大多数到公共卫生工程、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去工作。二次大战以来，在美国和英国，人类学者和医学专家的合作在不断地发

展。例如在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校已经对供水系统加氟作用建设的社会反映进行研究。在英国，一个人类学者参加了这样一个小队，该小队研究南威尔士精神病流行病学。

应用人类学的目标：方向的改变——按照这个方向在寻求人类学的应用——经济人类学者说明他们的作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些在使他们自己负责决定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持犹豫态度的人，在说明什么方法将为公共卫生计划的成功提供最好的机会时，就比较爽快。那些认为他们对殖民政府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必定是背离目标的人，对独立国家进行这种阻拦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关于是否人类学者应该参加发展计划或是否人类学者应该仅仅拿出他们的事实让行政当局自由处理的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这种取消的观点必定会使应用人类学知识的这些设想变得没有价值。因为人类学者的理论工作不是集中于行政问题上，它的活动含意，只能由其他的专家来认识。相反的观点是：人类学者必须自己进行政策的推荐。这一点在美国应用人类学会的伦理学法典里说明了。……人类学者应该感谢他的同行对于他的尊严和尊重。他可能不会代表他和其委托人利益而提出任何行动的过程。特别是当其他人的生命、健康、尊严和自尊可能受到有害影响的时候，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证这种作用达到最小的程度，来保证这个作用在将来会比根本不采取任何行动更有好处。他必须特别注意保护为他提供信息的人，特别在信任方面，为他提供消息的人，可能不会为他们自己保证这种信任。

他一定不能对他们委托人提出任何允诺，也不能鼓励他没有理由希望实现的期望。他必须根据其总的利益和幸福来考虑他们的专门目标。在这些问题上：他对他的委托人科学

家、他的同行等的责任特点，他必须对每个委托人有个清楚的了解。（伦理学阐述……1963—1964，第237页）

纳德尔（1953）敦促道：如果人类学者没有提出直接对制订政策作出帮助的权力，那么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可能被用来鉴于他没有详细的记述，损害他们所描述的社会。巴尼特的声明中也包含着同样的态度，他说：人类学“暴露了无权陈述自己情况和理由的人”（1956，第80页）。比尔斯敦促道：应用人类学应当注意发现不能言喻的民族在想什么，进而帮助他们来得到它（1953，第188页），塔克斯也提出过敦促（1958，第17页—19页）。

所有这些对人类学者作用的说明都否定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他的措施技术建议是适应的。因此，也是无价值的。但是，在殖民时期，应用人类学的价值问题是有它的特别重大意义的，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同，在那种形势下，有时寻求和提出需要人类学者的建议。殖民地政府把他们的“文明使命”与其他事情相比较，比作为提高士气的过程；人类学者并不是总把政府尽力引起的那种变化看成为士气的提高。就他们本身来说，人类学者关心的是，与政府有关的社会变化过程应当对客观社会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其目的是随时介绍评论的价值。认为正在强加给比较简单的社会的变革必然会是有害的那些人不能期待政府会同意他们的观点，然而可以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很明显，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府的价值观念不同，因此使他们很难提出某种会促进执行政府政策的建议。这并非偶然，随着殖民统治的撤消，应用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新独立的政府象早先独立的国家一样来看待他们的作用：不是改造不同的社会，而是提高生活水平，扩大福利事业。他们相当肯定他们要创建的社会，对

于这一点，他们不要求任何人的建议。当他们确实需要建议的时候，那也得在价值观念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大家一致同意健康是好的；追求安宜和物质财富，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允许的。还是没有邀请人类学者对于寻求合作的工程的功过作出评价，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适的，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士气政策往往不大合适。人们不要他们，人类学者也不需要，对社会变化的全过程提出建议；他们现在的作用是表明在哪些方面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会给专门的计划带来阻碍。

原作者 露西·梅尔

参考书目：（略）

华中师范学院 邢文藻 译校

中南民族学院 刘孝瑜

译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

1968年版第一册